

海外汉学中的中国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综论^①

陈 永 (华中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在中国近代, 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界的互动交流, 形成了海外汉学中的中国音乐文化“共同体”。此“共同体”的学术基础及其研究进展, 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引起音乐史学界的充分重视。近年来, 国内音乐学界对这一“共同体”的学术研究, 有所关注, 但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零星作业, 尚待推进和深入。本文借助海外汉学学科的学理基础, 对中国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的必要性、学术基础和学科构建等问题, 进行了概略性探讨, 以期探索实践“以中释中”→“以西释中”→“阐释和合”→“和而不同”的学术范式, 推动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学科研究的迈进和完善。

[关键词] 海外汉学; 中国近代; 音乐史; 视域融合; 史料互惠;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 J609; J6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67(2022)01-0092-06

中国近代音乐历史, 是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延续之“合力”下形成的一个音乐文化多面体, 显示出基本的三个维度。其中, 引进的西方音乐是主“变”的一面, 承续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主“通”的一面, 还有一面是中西方音乐交流之“和”。“变”与“通”的历史维度, 相对而言是单向度的存在, 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然最为突出; 而“和”的形成, 则是中西方音乐双向交流的结果, 研究难度较大一些, 相对于前二者, 其成果要少得多。要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 借助海外汉学的学术基础势在必行。

“汉学”(英文 Sinology), “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 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1] 国外最早的汉学研究源自法国法兰西学院在 1814 年开设的“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研究”。^[2] 现已在世界各地多国形成了多样的汉学研究机构,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流向国内, 其中部分艺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 必将为中国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所借鉴。

目前, 国内学界关于“海外汉学”这个学术概念, 尚有“域外汉学”“国外汉学”“国际汉学”等多样别称。本文取用“海外汉学”的学术范畴及其研究范式, 主要是基于学术性的研究定位考虑。“国际”, 相对而言, 是一个倾向于政治性表达的术语。而“域外”“国外”“海外”三者, 都是地理性概念, 较适于学术研究的论域限定, 此三者之中, “海外汉学”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多, 参见表 1。

表 1. 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主要成果数据表 (数据资料截止日期 2021.1.16)

关键词 成果来源	域外汉学	国外汉学	海外汉学
“读秀”图书	143 种	210 种	772 种
知网期刊论文	51 条	34 条	401 条
知网硕博论文	10 篇	14 篇	49 篇

所以, 本文将借助海外汉学的学术范畴和研究范式, 讨论中国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海外汉学学科对于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现有文史研究中业已成熟的学科——海外汉学, 可成为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学科资鉴, 在研究观念的转变、客观史事的充实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诸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视域融合

中国近代的音乐文化, 受制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中西音乐交流过程中, 突破了中、西、古、今的一般时空性, 突破了古代音乐史的构成体系, 使它不同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自身一贯的基本构成体系——律、调、谱、器, 在基本面貌和整体特征上, 呈现出“通”“变”“和”的多元属性。所以, 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及其中外音乐交流史, 在学科观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有着承续古史而又超越古史的诉求。然而, 音乐学科对自身的理论认识,

收稿日期: 2021-01-18

作者简介: 陈 永 (1965—), 湖北省利川市人,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音乐史。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晚清音乐史研究”(项目编号: 19YJA76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以英文形式发表于《中国艺术季刊》(Chinese Arts Quarterly) 2019 年第 3 期。现经过部分修改, 并征得原刊的同意, 以汉文形式与国内音乐学界交流, 期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总是滞后于其他大学科,如文、史学科。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认为,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文学史”写作和教学的自觉选择,得益于“三大支柱”:科学精神、进化观念和系统方法的引进。“凸显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进”^[3]。晚清学界的这一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对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行为来说,仍不失为学术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取向,即走向世界的视域融合。

今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其编辑目的是“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4]此目的,对于中国近代海外汉学音乐史的研究而言,是一个总体的学术目标,无疑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应有的国际学术视域。

从学科观念和研究视域而论,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及其成果,如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陈聆群的《中国音乐简史》等,其史学观念,主要依托于“冲击与回应”“启蒙与救亡”“民主革命”等基本模式上,而相对较少针对文化本身的多样认识和开放的研究观念。在这方面,海外汉学自身多样化的学术观念和学科范式,应为中国近代音乐史及其中西音乐交流史,提供更多有益的参鉴。

海外汉学是国外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认识和研究,毫无疑问,其学术视野当是有别于国内同类学界的。据海外汉学史的研究显示,在东西方汉学史上,大致产生了五种不同的汉学史观:1. 欧洲中心论;2. 中国中心论;3. 民族、文化优劣论;4. 儒家中心论;5. 汉文化宗主国论。^[5]²⁴⁵这些汉学史观,将弥补国内同行研究的不足,更是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必须借鉴的学术视域及理论范式的他山之石。

基于上述学科的内外情势,中国音乐史学界正在关注和研究的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当在原有聚焦“通”“变”格局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海外汉学的学科基础和学术范式,推进中国近代音乐之“和”的研究进程,实现音乐史学与海外汉学的学科视域融合。使中国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在既有的“以中释中”观念基础之上,参鉴“以西释中”,进而“阐释和合”,实现“和而不同”的历史理解和学术阐释。本文认为,这将是近代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之历史观念的一次“突围”。

(二) 史事补缺

目前,国内音乐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其成果仍体现出一种“厚今薄古”的倾向,即近代前期(晚清)部分的史事叙述比较薄弱,近代后期(民国)部分相对比较详尽。造成这样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观念的、研究方法的局限,也有史料开掘运用的不足。特别是在集体写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对海外音乐研究视若禁区,比不上后来相对宽松的学术研究条件。及至今日,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有条件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之上,关注更多与西学东渐以及华乐西传相关的史事、人物和史料等问题,重新发现中西音乐交流史的“新大陆”,有望补缺中国近代音乐史中新的史事——华乐西传史,可以把晚清时期的音乐史事补充得更丰满。

近年,有海外华裔学者官宏宇,他在海外所做的中西音乐交流的系列研究,特别值得国内学界关注和重视。官宏宇对近代来华西人的经历、音乐活动和音乐著述的各方面,都有系列系统的研究,展现了部分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的新史料,构建了新的历史场域。在“官著”《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一书中,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如:法国汉学家拉卢瓦及其著述《中国音乐》(1909)、《淮南子与音乐》(1914)、《音乐家孔子》等;美国音乐家爱希汉姆及其音乐作品《东方速写》(1918—1920)、《东方印象》(1922)、《中国传奇》(1924)等;英籍犹太音乐家来维思在中国的活动及其著述《中国古代的音乐艺术》(1935)等。展示了国内学界未曾谋面的一些新史料,还通过对这些海外汉学的西人学者的活动细节研究,回溯历史现场,拼接历史碎片,重组了一个个相对完整的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场景,补缺了部分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事实。^[6]

这一新的研究动向,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日益增进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流,在海外汉学的音乐研究成果中,逐渐明朗起来。此举对于那些曾被忽略的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中之史事的客观性存在,有着补缺、充实和证实的学术价值,充满着开放性的学术期待。

(三) 史料互惠

史事的补缺,离不开史料的发现和运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素。史料的拓新,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一贯的期待和坚持。目前,对于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史料掘新工作来说,一方面期待在国内各研究领域获得有可能新的发现,同时也希望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新的识见。

史料互惠,典型的例子,当数法国汉学家莫里斯·库朗(Maurice Courant, 1865—1935)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与中国学者相互之间的史料参鉴及其互惠影响的过程。在库朗的《中国古典音乐史论》等研究中,展示了中国音乐史学中鲜见论及的文献史料,如《韶舞九成乐补》《苑洛志乐》《徽言秘旨》等。这些史料,或将在同一领域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目标,产生新的学术“史链”。从既有的学术史来看,库朗的研究,相继影响过中国音乐史学的各代学者,如王光祈、钱仁康、官宏宇等。

中西音乐交流研究中的史料互惠作用,在当下新的资讯传播渠道的影响下,越发体现出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如,

近年有中国学者孙晨荟,研究滇藏川交界地区天主教礼仪音乐,是因为作者意外得到了一本1894年法国出版的四线谱藏文歌谱本原书,促成了一项专题研究。^[7]再如贵州音乐学者蒋英,因势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得现代便捷的资料传播条件所助,获得了当年传教士留下的部分原始资料,催生了他对贵州石门坎的近代来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及其在贵州的传教音乐活动的系统研究,其专题研究成果《中国石门坎波拉苗谱考》即将面世。

笔者所见,有部分海外汉学学者的研究,确实为国内音乐学界展示了部分新的史料,推动了国内同行的同类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少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较早的研究,以法国的陈艳霞著《华乐西传法兰西》(耿昇译,商务印书馆,1998)为代表,对中国国内同行的影响最大。21世纪以来,当以宫宏宇的研究影响为最。与他们相呼应的是,国内音乐学界陆续推出的部分硕、博士学位论文,如《花之安在华传教活动及其思想研究》(张硕,北京大学,博士,2008)、《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邱洪艳,华东师范大学,硕士,2009)、《高罗佩笔下的唐朝社会生活》(方媛,西安音乐学院,硕士,2018)、《近代福建海上音乐交流的初步研究(1840—1949)》(吴少静,福建师范大学,硕士,2003)、《狄邦就烈在登州活动研究》(闫翠翠,山东师范大学,硕士,2010),等等,都在不同的领域展开了新的研究。这些研究,从音乐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来看,一部分是基于海外汉学音乐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国内研究者的新发现。可以说,二者的研究,其史料互惠的过程与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近代,中国音乐与中国音乐人,曾经触动过、惠养过诸多来华西人,他们共同构建了近代中西音乐交流的基本史实,亦催生过一批研究中国音乐的论著,这是一座尚待开掘的音乐学术新矿。而如今的海外汉学音乐研究,不管是发掘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的新史料,或是海外汉学中基于旧史料的新阐释,这对于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而言,应有观念、方法和目标性的全面收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中的海外汉学研究基础

(一) 海外学者的汉学著述及其译介研究

欲构建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中的海外汉学音乐研究的学术基础,须先了解相关来华西人的基本历史事实,经此学术入门的主要渠道当是既往文献史料和当世著述。现今所见,此类著述的作者,大多是曾经的来华西人,或者是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基础的汉学家。所以,对海外学者的汉学著述及其译介的研究,应是重要的先行举措。

通过此类著述,可以了解有来华西人特别是音乐人在华的生活轨迹、音乐著述和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基本情况。这类成果,中国近代已有零星的译介研究,如法国裴化行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等。而相对较多的学术关注和译介推广,应是20—21世纪以来的事情了。代表作有:法国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英国艾莉莎·马礼逊的《马礼逊文集:马礼逊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8)、荷兰巴克曼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葡萄牙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商务印书馆,2012)、意大利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英国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英国伟烈亚力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等等。

其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也是当今研究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早期西方汉学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原著于1973年在罗马和巴黎出版,书中列传的耶稣会士多达975位,参考书目345种。尽管书中列传的人物限定在1552—1800年间,但书中大量的参考书目,对于中国近代早期的来华西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还有前述“清史编译丛刊”之一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是近代较早的来华西人著述。作者伟烈亚力,原是1847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他的著作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书中记录了19世纪初至1867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共338名,以人物简历、汉语著作、英语著作等内容板块,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各位传教士的基本情况。更值参鉴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其研究得到传主高罗佩后人的全力支持,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和手稿资料,是一部全面展现近代来华的荷兰外交官、作家、诗人、汉学家、音乐家高罗佩精彩人生的大作。该书中所用史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若与中国音乐学界研究高罗佩的著述,如严晓星编《高罗佩事辑》(2011)、施晔著《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2017)、张萍著《高罗佩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2010)等相参照,史事互证,相得益彰。

以上述海外学者的汉学著述为基础,再与国内学者同类著作相参照,按图索骥,探寻部分来华西人中的音乐人及其事迹,如利玛窦、马礼逊、李提摩太等的历史踪迹,构建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场域图,由此可迈出海外汉学音乐学研究至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第一步。

(二) 国内文史学者的基础性研究

中国国内文史学界对于海外汉学的学术性研究,其发轫主要集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较早的文史研究,有向达的《中外交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张星娘的《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等。此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学者们多立足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自强之心。此一代学者学贯中西,他们在文献史料的搜罗上极显功夫,此类研究奠定了后来新中国同类研究的学术基础。

20 世纪下半叶,其主要工作的开展和成果的展现,当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前十年。如:顾长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沈福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刘登阁、周云芳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等,以及已结集出版多种成果的“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国际汉学》学报(北京语言大学,2000—2018),等等。都是研究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必不可少的学术门径。

上述之(一)(二)两类著述,当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外汉学的基础文献,自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基础之基础。

(三) 海外华裔音乐学者的专题研究

中国近代中西音乐文化的双向交流进程,成就了诸多海外华裔音乐学者,如早期的王光祈、周文中、韩国鏞、陈艳霞,及至后来的宫宏宇、梁雷等。他们在海外研究中国音乐,成为海外汉学音乐学研究的主力军,贡献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下文略述部分代表著述。

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在《中国史科学与中国音乐研究:我的一些看法》(1967)一文中,提到诸多汉学音乐家,如阿理嗣、利伯曼、库特纳、高罗佩、毕铿、马丁·吉姆等,并对海外的中国音乐文献史料及其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是较早的海外华裔音乐学者的先行者。

美籍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鏞先生,出版有《音乐的中国》(1972)、《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1981)、《现代音乐大师江文也的生平与作品》(1984)、《留美三乐人——黄自·谭小麟·应尚能留美资料专辑》(1991)、《中国乐器巡礼》(1991)等关于中国音乐的系列研究著述,侧重于对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研究,新拓了部分新的史料,引得国内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界同行的关注和参考。

法国华裔音乐学者陈艳霞所著《华乐西传法兰西》一书,于 1974 年在法国出版,国内引进翻译出版在 1998 年。该书是中法音乐交流研究的奠基之作,是国内同类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新西兰华裔学者宫宏宇,在二十多年中一直专注于探究中外音乐交流史,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专著《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此书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2018)”中。在“宫著”中,作者充分地运用了海外汉学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方法,在追索那些涉及音乐的来华西人的“学脉”时,极其细致地梳理了国外汉学学者和学派“门庭”关系,为中国近代音乐交流史的后续研究,打开了一扇学术门窗。在海外汉学音乐学研究领域,建立起了一定的学术标准。^[8]

当然,还有更多的海外华人研究成果,不断为国内学界所重视和引进,这必将对我们的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起到他山之石的重要作用。

(四) 国内音乐史学者的专题研究

在国内,“中外音乐交流史”的专题研究,其早期的奠基之作,主要有冯文慈著《中外音乐交流史》(1998)、陶亚兵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1994),以及钱仁康的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陶亚兵的著作,是专门研究明清以来的中西音乐交流,对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海外传播与交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与全面的研究,为之后国内同类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和研究范式。

至 21 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于海外中国音乐的学术研究成果渐渐多起来,主要有:王静怡著《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2009)、林青华著《中乐西渐的历程——对 1800 年以前中国音乐流传欧洲的历史探讨》(2014),等等。

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金经言《几部研究中国音乐的西文著作》(1995)、周广平《多元音乐文化的融合——海外华人音乐》(2005)、李云《中英音乐交流的三个阶段》(2006)、严晓星《高罗佩以前古琴西徂史料概述》(2008)、余亚飞《18 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例》(2013)、欧阳青梅、臧卓敏《20 世纪古琴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生存状况探究》(2014),等等。

此类研究成果,研究对象广泛,成果推用渠道畅通,堪称国内音乐学界海外汉学音乐研究之“半壁江山”。

三、海外汉学在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中的学术构建

(一) 学术论域和学科范式的研究

目前,在中国学界,海外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研究方向,其研究系统业已成熟,在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学术发展史和学科思想等诸方面,均已形成基本稳定的研究范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等校,还设立有专门的海外汉学研究机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有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国际汉学》等。^[9]海外汉学这一相对完备的学术基础,当为中国近代音乐史学所借鉴。全面拿来,较快好省地完成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学科史、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的整体构建。

观海外汉学的学术史,可见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类:1. 语言学的研究;2. 文字学的研究;3. 历史学的研究(这是海外汉学研究中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4. 宗教学研究;5. 思想史的研究。^{[5] 目录}

在此明确的研究取向中,艺术史特别是音乐史研究的缺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海外汉学研究中注入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新主题,关注对自身学科的基本认识(观念、方法、史料),创生新的学术语境(阐释、表述),进而深入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视角,推进中西音乐交流史学科的学术史研究、专题研究和国别汉学音乐研究等各项具体研究,逐步完善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学科构建。

(二) 对海外中国音乐史料的翻译研究

近代来华西人,对于中国音乐的传播、交流和研究,已形成了有体系、有规模的音乐文本文献,其语言载体,有部分中文的,但大多是西文的。所以,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在厘清了基本学科范式的前提下,再对涉及西人的中国音乐论著、海外华人的中西音乐交流的西文著述等,做进一步的音乐文本“回译”,把它们译介给国内学界,这是研究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根本性、实质性工作。

“回译”的文本选择和操作要求,可参考前述“清史编译丛刊”的基本范例。还有“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选印了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海外汉学译著近百册,其中有部分音乐类文献,可资参鉴。

这一工作所涉著述,前文大多已经述及,代表性者,如:美国人福路的《中国教会音乐》(*Music in the Chinese Church*)、李伯曼《中国音乐书目长编》(1970)、法国汉学家库朗《中国古典音乐史论》、拉卢瓦《中国音乐》(1909)、《淮南子与音乐》(1914)等;法国爱德华·沙畹的《中国音乐和希腊音乐的关系》、英国来维思的《中国古代的音乐艺术》(1935)等。这些海外汉学音乐史料的翻译,对于完善中国音乐史学的文献资源建设,实现前文所述史料互惠、史事互补的学术目标,是一个切实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而延展涉及英、法语言之外的其他语种,如德、意、西、葡、俄语等多语种的海外汉学音乐史料的译介研究。

(三) 音乐家与音乐文本的专题研究

音乐史的研究,最终必须落实到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音乐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乐谱、声音、文字、图像等。由于时代的局限,近代早期的中国音乐在海外的交流文献,主要集中于乐谱、文字和图像的存在。今以来华西人的音乐人为中心,以音乐文本为载体,展开各项专题研究,从而实现这一学科从中心到外围的有序构建。

前文述及“海外学者的汉学著述及其译介的研究”的问题,即是以音乐学人为基础,继而衍生和展开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理论文献的研究。汉外汉学研究中的现有各类成果,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人物研究学术资源,可供音乐学研究直接参鉴,如宫宏宇著《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2017)、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2002)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海外汉学音乐人物谱,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可按图索骥,分类索引,再行乐人的专题研究。

在海外汉学中的音乐文本研究,一方面,是指海外汉学中的乐典研究,即中国音乐典籍在国外的流播、运用和阐释。此类研究范例如:姚达兑《〈粤讴〉的英译、接受和叙事》(《文化遗产》2011.03)、张大英《论英国学者毕铿之〈说文〉音乐词汇研究》^[10]等。另一方面,音乐文本研究还可回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体系中的律、调、谱、器的学术范畴中去,即专注于散播在海外汉学中的中国音乐体系的乐律学、宫调理论和古谱学的研究。还有一部分音乐文本研究,其对象是中国的民间音乐,如对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历史考究与文本分析,也可作为范例。

(四) 不同区域(国别)汉学中的音乐学研究

此研究内容构建,是在上述乐人、乐典和乐律研究基础之上的延伸性研究。海外汉学中的音乐交流,由于受到近代多个来华强势西国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学术风格,欧、美各国各地,显现出不同的文化交流特色。所以,在具备了上述海外汉学音乐学的各项学术构建后,可分不同的国别或地区,探究海外汉学音乐学的区域特点,展现中国音乐在海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特色,从而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构建起海外汉学音乐学研究的“全息”图景,为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纵深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构想,只是笔者在海外汉学影响下,对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问题的几点思考,不足以概括中西音乐交流史的学科构建,尚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总之,对于既有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科来说,海外汉学中的音乐学研究,应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之史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学术领域而言,海外汉学提供了新的学术方向、新的学术视域、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文献史料,已为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界所重视。当然,海外汉学中的中国音乐研究,虽然其切入点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领域,但仍然指涉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部分内容。那么,在世界史和“通·鉴”论的学术观念指导之下,秉持文化互通、学科互鉴的理念,研究海外汉学中的中国音乐,从而使中国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循序渐进地探索实践“以中释中”→“以西释中”→“阐释和合”→“和而不同”的学术范式,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催生新的研究成果,客观呈现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三维度,以推动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整体性进步。

(下转第112页)

表现在文字上是平去、平入、去平与上去等结构，利于表现质朴沉郁的情绪”^[11]。这与商调善于抒发悲切伤感情绪的特征较为一致，由此可见南方地域音乐对晚唐五代词乐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之此时词乐的创作和接受逐渐向文人阶层和贵族阶层移动，重女声、尚婉媚渐成风尚，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词乐艺术以柔婉为美的美学属性。

结 语

《尊前集》和《金奁集》中所收词调的基本情况和其中记录的宫调信息是反映晚唐五代词乐发展的一个侧影，从形式和风格来看，中唐至晚唐五代词乐的创作经历了形式逐渐固定化，风格特性逐渐鲜明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文人为主的创作主体，并且具有鲜明的审美风格。首先就曲调而言，商调的运用为词乐蒙上了一层哀怨柔婉的气质，这与文学领域论晚唐五代词通过讨论词人在内容表达上偏爱颓废、寂寞、抑郁等主题所得的“以悲为美”的评价一致，由此说明了词与乐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音乐对词乐样式和风格的形成所起到的巨大影响。其次从创作和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词乐的创作和接受人群主要集于固定的贵族和文人阶层之内，所以朝着“精雅”化的方向发展是此时词乐的主要趋势。最后从功能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因为此时词乐充当着贵族筵席娱乐的角色，使得其“艳丽”和“软媚”的一面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词乐又逐步深入到了文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成了他们传达自我情感的重要工具，从而引申出较为内敛含蓄的特质。这些特征基本奠定了词乐以“柔婉”为美的本质属性，也对随后到来的北宋词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书尊前集后[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朱祖谋，蒋哲伦·《尊前集》附《金奁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 [2] 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0-31.
- [3] 朱祖谋，蒋哲伦·《尊前集》附《金奁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 [4] 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 蒋哲伦·《尊前集》和早期文人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39-41.
- [6][清]朱孝臧·疆村丛书·尊前集一卷[M].梅禹金藏明钞本，广文书局，1970.
- [7][唐]段安节·乐府杂录[M].罗济平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0.
- [8][宋]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礼乐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元]脱脱，等·宋史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47.
-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志第九·音乐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郑绍平，赵卫华，等·倚声探源——对宋词本体的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21-22.

（责任编辑：黄雪虹）

（上接第96页）

参考文献：

- [1]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5.
- [2] 方维规·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27.
- [3]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5-6.
- [4]（英）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M].赵康英，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
- [5]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45.
- [6] 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75+198.
- [7] 孙晨荟·雪域圣咏——滇藏川交界地区天主教礼仪音乐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0：352.
- [8] 陈永·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三维度——评宫宏宇著《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J].中国音乐学，2018（4）.
- [9] 王尧，季进·下江南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
- [10] 张大英·欧美《说文》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125-132.

（责任编辑：李小戈）

Review of Domestic Urban Mus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al Anthropology

Hu Bin

Abstract

The study of urban music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us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urban study of Chinese musical anthropolog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urban music as the object and western musical anthropology as a theoretical metho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ities make the study of urban music anthropology in China present diversified features. Among them, "Music Shanghai Studies"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urban music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has played a reference role in the study of music in many other cities in terms of ideas and methods.

Key words

urban music anthropology, Music Shanghai Studies, urban music

A Summary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usic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Modern China in Overseas Sinology

Chen Yong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siting Westerners and Chinese music circles formed a "community" of Chinese music culture in overseas sinology. The academic basi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is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music history, which should be paid full attention to by the circle of music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musicology circle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is "community", but it is only some sporadic homework that is not systematic and needs to be promoted and deepened. With the help of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overseas sinology,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foreign music exchanges in modern 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interpreting China with the Chinese",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with the West", "interpretation and combination",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academic paradigm,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exchanges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sinology, modern China, music history, fusion of horizons, recipro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The Inspiration Brought to Us by the Creation of Beethoven's Tenth Symphony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n Baoq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c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mposing Beethoven's Tenth Symphony,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ic research work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ic,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I. music, Beethoven, music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Dance

Zhao Shufeng

Abstract

Anthropology of dance i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dance ontology and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body language i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social, political, religious, folklore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contexts.

It mostly focuses on placing the dance text constructed by body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investigating the mutual refer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nd dance ontology and i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cademic concept and research paradigm of investigat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action of music and dance ontology as a cultural displa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n dance anthropology i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based on fieldwork and the historical level of dance anthropolog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Key words

body, text, context, representation, dance anthropology, dance ethnography

From *Border Town* to *Happy Flower Mountain* ——Review of Xie Xiaoyong's Large-scale Dance Drama

Yu Ping

Abstract

Xie Xiaoyong was a student in the choreography class of Beijing Dance Academy in the late 1980s. After graduation, he went to work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Dance Troup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en Qiao and other seniors at that time, he turned his creative attention to his haunting hometown - Xiangxi! Xie Xiaoyong's first dance drama was "Border Town". He transformed the novel into a dance drama, and tried to lay it out in a prose and poetic mood, reflecting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ten years later, Xie Xiaoyong became the head of Guangdong Southern Song and Dance Troupe and launched the second dance drama "Xi Lan Ka Pu", which not only serves as a dance drama, but also maintains a strong regional style. Xie Xiaoyong borrowed Tujia folk legends to convey the spiritual appeal of the infiltration of "Xi Lan Ka Pu" brocade. Since then, Xie Xiaoyong, who has a "Xiangxi complex", was touched by Tao Yuanming's story of "Wuling people fish for living...", and presented Tao Yuanming's yearning "Utopia" on the stage through the dance drama "Tao Hua Yuan Ji". Later, he was invited to Ningxia to create a dance drama "Xi Xia Yi Shi" with strong emotion, strong theme, and rich styl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large-scale dance poetry drama created by Xie Xiaoyong for the Hunan Song and Dance Theater is an excellent "realistic theme" dance drama.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volving 8000 Hunan Women in the early 1950s, this dance drama deduces an epic song of life.

Key words

Xie Xiaoyong, large-scale dance drama creation, review, Western Hunan complex, regional customs